

普實克的中國文化觀

陳 國 球^{*}

作為歐洲學統養成的一位漢學家，普實克（Jaroslav Průšek，1906-1980）一如他的同道，以厚實廣博的歐亞語文學知識，深耕細作於個別研究課題而屢有所得，例如他對中國北方邊疆民族的研究就是其中的代表作（*Chinese Statelets and the Northern Barbarians 1400-300 B.C.*，1971年）。然而在此之上，普實克的漢學研究還別有一種讓人讀來溫暖的感覺。中國文化於他，親似姊妹，好比他人生第一次遠東之遊回國後撰寫的回憶錄書題所示（*Sestra Moje Čína*，1940年；英譯 *My Sister China*，2002年；中譯《中國——我的姐妹》，2005年）。他也和許多西方漢學家一樣，對中國有許多異域想像；但觸動他的敏銳感覺的，不是書面上的知識，而是他與中國文人（如冰心、鄭振鐸）、藝術家（如齊白石），以至市井的販夫走卒的交流互動。他所描繪的中國圖像，往往由具體經驗出發，故爾生氣洋溢，〈論中國文化的幾項基本特徵〉正是這樣的一幅圖像。

這篇短文章發表於1960年他所主編的《新東方》雙月刊創刊號，後來收入《中國歷史與文學》（*Chinese History and Literature: Collections of Studies*，1970年）一書之中。這是普實克兩本譽滿歐美漢學界的著作之一；另一本是李歐梵為他編集的《抒情的與史詩的：現代中國文學研究》（*The Lyrical and the Epic: Studies of Modern*

^{*} 作者現任香港教育學院人文學院院長兼中國文學講座教授。

Chinese Literature，1980年）。《中國歷史與文學》一書因為未曾譯成中文，所以在華文地區的影響較後者為小；然而這本載錄普實克三十多年來有關古代文學與「中世紀」話本小說研究的著作，其實比專論現代文學的《抒情的與史詩的》更能顯示他觀察中國文化的寬廣視角和深度。以深度而言，例如書中三篇論蒲松齡（1640-1715）的文章，應是當時相關研究最高水平的表現；以廣度而言，全書首兩章更是明證。開卷第一章〈論中國文化的幾項基本特徵〉（“Some Basic Features of Chinese Culture”）與第二章〈中國與西方的歷史與史詩〉（“History and Epics in China and the West”，1963年）都是從中西比較的角度，綜論中國文化特色。後者以史書與文學的敘事體為據，探討中西的思考模式（thought pattern），以及對現實的不同感知態度和方法（perception of reality），其副題為「人間故事的不同構思方式研究」（“A Study of Differences in Conception of the Human Story”）。〈論中國文化的幾項基本特徵〉則視傳統中國為一「古典文化」（a classical culture），與歐洲的希臘文化並置，從而探討中西藝術之異同。普實克以為西方藝術以具體個人（甚至人體）為中心；而中國藝術品中的人，卻往往泯沒於「自然」之中。他又認為中國藝術一般比較「自在不拘形式」（informal）、「親切」（intimate），傾向「即興」（improvisation）與「消閒」（dilettantism）；意在「整體」（whole）而非局部，在時光之流的「浮移印象」（fleeting impression）而非切割下來的靜止事物；歸根究柢，他認為這是異於西方之觀照「現實」方式。

顯然，普實克觀察文化的立足點是人如何理解「現實」、如何直面「現實」。這「現實」是廣義的，非僅止於物理的、物質的現實世界，還包括人的內心世界、精神世界。我們知道，自二十世紀初，中歐藝術的前衛思潮發展特別興旺。處身於社會主義陣營的普實克，並沒有排斥「超現實主義」、「抽象主義」等藝術方向。文中比較中國傳統與二十世紀西方藝術的抽象表現，就非常值得注意。他對照齊白

石與馬蒂斯（Henri Matisse，1869-1954）及盧梭（Henri Rousseau，1844-1910）的畫風以至其構圖方式，看到其間的類同之處，也體察到兩者在意蘊上的鴻溝。他認為中國傳統藝術不會流於形式主義，因為其背後精神境界之美善合一以至於「仁」，有終極的人文關懷。他更認為現代（西方）社會面臨種種困難，正可以取資於中國傳統文化，以解倒懸。

普實克對中國文化的觀察，自有其政治與社會的時代脈絡。我們今天再聆聽這遠方響起的聲音，當然會有不同的詮解方式和價值判斷；然而，在空間與時間的置換過程中細意體味不同出發點的論述，可以豐富我們對傳統與現代的認知，有助尋索當前的懸解方案。